

肠断江南

肠断江南

腸斷江南

龍門叢書

庚信与齐梁文士现象

牛贵琥

肠断江南

肠断江南

总 序

沿着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双轨，我们启动机车，向龙门进发。

黄河东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龙门，神州之形胜；

龙门，中国文化之门；

龙门，开凿混沌的象征；

龙门，开放发展的印证！

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辉煌而又沉重、它的精魂在文学的形象中载沉载浮。传统文学不是苍白的幽灵，而是鲜活的生命，它在现代人的交流、对话中获得启生。

作为民族感情的升华，作为民族精神的闪光，作为民族灵魂的动作，作为现实的文化背景，作为民族存在的根据，我们试图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的生命底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在以丛书的形式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时代呼声作出一种回应。如果根据周易的原理，将文学分为艺术及思想内容层，个性心理意识层，群体心理意识层，民族及人性心理意识层等四个不同层次，那么我们现在更着意于探索其深层的“动静”，沟通历史与现实，通过昨天的反思，认识今天的形象。审美说到底是一种生命存在和体验的方式，对民族审美体验的结晶物——文学的重新品味也就是民族生命的认同和更新。

龙门是神秘的，龙门是幽邃的，龙门是开敞的。我们将深入，再走出，然后跳过！

我们曾经都是鱼，我们将成龙，还将在见前不见尾的腾挪变幻中向无际的天宇作永恒的追寻。

《龙门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一	断肠春色在江南	(1)
二	王室身家两唏嘘	(7)
1	世德——导致没落的时尚	(14)
2	王室——无法自我振作的集团	(30)
3	悲哀——形成丧亡的怪圈	(45)
三	身非蛱蝶自颠狂	(62)
1	虚诞——徒具形式的风度	(80)
2	享受——生活世俗化的追求	(95)
3	诗文——体现能力的唯一标准	(109)
四	两地风流万古哀	(126)
1	保身全生——自利求存的处世态度	(139)
2	忠的虚伪——一个不必要提起的话题	(156)
3	倡优角色——装点门面的工具	(178)
五	不竞南风话短长	(195)

一 断肠春色在江南

江南，一个多么美丽而迷人地方。它那秀丽的山水、温润的气候、丰富的物产，使得多少人迷恋、讴歌：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碧水绿如兰。”

“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

江南春色是欢乐的象征，充满无限柔情，但是很不幸，它在历史上和孱弱联系在一起，凡是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几乎无一不是以软弱腐朽而著称，受尽了文人墨客的揶揄和哀悼。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正如某些人所言，和地域当然有着关系。不过，这决不是唯一的因素。也就是说，江南民风软弱并非命中注定。春秋时期的吴越曾经争雄一时。消灭强秦的也是三楚义军，三国时的孙吴虽然只保有江东但毕竟使对手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蜀国的黄权也不无顾忌地谈及“吴人悍战”^①。所以，当时的人顶多说“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②，也不能得出民风软弱的结论。江南和民风软弱联系在一起是从南朝开始的。

① 《通鉴纪事本末》810页

② 《史记·货殖列传·三王世家》

自从五胡乱华、晋室南渡，中原的世家大族就带上书籍礼器率领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纷纷渡过长江，和江东的世家大族共同建立了东晋政权。在此后的 232 年之间，虽然有过政权的多次更替，但是社会基本安定，江南得到开发，经济和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到了梁武帝的时代，这一局面达到极盛。人们公认“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就连北方敌国东魏丞相高欢也要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①当时朝野一片承平气象。庾信对此就有生动地描述：

“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沔浮玉，南琛没羽。吴歆越吟，荆艳楚舞。

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哀江南赋》）

如果说文学作品有些夸张，那末《太平环宇记》所引的《金陵记》说：“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则可以给人一个建业城繁华的具体印象了。然而，公元 548 年 10 月 23 日，前一年还处于穷途末路只好投降萧梁的东魏叛将侯景，只带数百匹马和八千余人，便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于 24 日包围了台城。萧梁的二、三十万援兵都畏葸不前，虽然城内防军尽力抵抗，但最终在 130 多天后被攻破。正巧又碰上疾疫，城内被围的男女十余万人、甲士两万余人，死了的就有十分之七、八，“横尸满路”、“烂汁满沟”，活着的只有

① 《南史·梁武帝本纪史论》《北齐书·杜弼传》

两三千人。侯景的士兵掠夺了粮米及金帛子女，首都的米价涨到一升七八万钱，数月之间“道路断绝”、“存者百无一二”。繁华壮丽的建业城在这次战乱中遭到破坏，以至于百济的使者前来入贡见到也不禁伤心痛哭。侯景攻下建业以后又派兵攻取吴郡、吴兴和会稽，所至披靡，杀戮抢掠，最为富庶的三吴出现大灾荒。史称“江南大饥，江、杨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要，俱缘山岳。芰实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叶，为之凋残。虽假命须臾，亦终死山泽。其绝粒久者，鸟面鹄形，俯伏床帷，交相枕藉，待命听终。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江南的人民，包括萧梁的王侯妃主、世胄子弟，被侯景的军人所抢掠卖掉或无法存活自相卖买流入北方的就有几十万人。侯景的残暴行为也使江南人触目惊心。他每次出兵，都要告戒他的部下说：“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攻台城造土山时，他就对人民“乱加毆捶，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城破后，设了一个大春碓，把反抗的人投进碓中“捣杀之”。又发明了一个大铍碓，把要杀的“先进其脚，寸寸斩之，至头方止。”他的部下也“专以焚掠为事”^①。经过南朝各代二百多年惨淡经营的江南，到此已是彻底凋残。虽然以后梁元帝平定了侯景，在江陵自立为皇帝，但不到三年也被西魏军攻破。他自己被处死，江陵城的男女十余万口作为奴婢驱入关中，小弱者全部杀掉。“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王气金陵渐凋伤，鼙鼓旌旗何处忙。”此时的江南使人扼腕哀伤。

① 并见《梁书·侯景传》

江左金粉、石城烟月就这样无可奈何地衰亡了下去，成了历代文士长吟短叹的题材。在这些伤悼的文士和作品之中，最著名的和最成功的就要数当时驰名南北的文学家庾信了。庾信，字子山，所以人们常称庾子山。生于公元513年，卒于公元581年。他和父亲都是梁太子萧纲的东宫学士。侯景包围建业城时，他肩负过守卫朱雀航的重任。侯景攻下台城，他间道奔向江陵，做了梁元帝萧绎的御史中丞。承圣三年出使西魏来到长安。没多久西魏便出兵攻下江陵，他从此被留在北方，历仕西魏、北周，直到隋开皇元年去世。“公私一例成虚梦，肠断江南日几回”。作为梁代兴亡的亲身经历者，庾信写下了著名的《哀江南赋》，其成就和价值超过了同时代的文人所作。所以，如果说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想要了解或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最好是先研究这一时期的某一个作家的话，那末“肠断江南”这个题目就只能是以庾信为中心。何况庾信在那个时代里作品存留最多，被称作集六朝之大成的作家呢。

不过，具体做起来便会感到有着许多困难。就从历史上对庾信本人和作品的评价来说吧，许多观点都是截然相反的。比如：有人认为他的为人是无耻的；有人说他在“忠梁与仕魏的矛盾”中的所作所为是可原谅的；有人认为他的《哀江南赋》不过是假惺惺的自我表白；有人则认为他的作品“篇篇有哀”情真意切；有的人认为他开启了有唐一代雄健的文风；有的人则认为他是“词赋之罪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令人困惑的看法呢？这是由于庾信的行为和作品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和矛盾现象所造成的。庾信这个作为南朝的臣子出仕北朝异族的人，既受到梁帝父子的宠幸，也

受到北朝王室的重视；既写过伤悼梁亡的作品，也写过歌颂讨好北朝朝廷的作品；既写过华实相扶之作，也写过大量绮艳的宫体诗和应酬文章。所以任何人都可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评价庾信而表现出喜好或憎恶之情。他们都有依据，你说到底是听谁的为好呢？

还有一个困难是有关庾信的资料太少。《周书》和《北史》的庾信传只是粗略地记载了一下他的经历，其它文献只有少量零星琐事留存。他的诗文集早就散佚，虽然现存为后人抄撮的诗文比起同时代的文人已不算少，但缺失仍然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正确勾画出庾信的真貌和他的心态。当然，这也不仅是庾信一人，整个南北朝都存在文献不足的情况，大部分文人若单个研究都是不容易的。

那末怎么做才好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以庾信为立足点，再将他和他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进行考查，这样便能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因为庾信本人和作品都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而且南北朝的文士集团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是共性多于个性的。这样做也更加符合本丛书揭示一阶段文化的生命底蕴，将其作为民族精神的闪光，作为民族存在的根据进行考查、分析、认识的目的。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所以本书将不会象写评传一样追求面面俱到或是作一般性的介绍，而是从庾信现象中抽出关键性的几点进行探讨。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历代对庾信的评价尽管看起来众说纷纭，实际上还是围绕着“肠断江南”这个中心。具体则是集中在庾信肠断什么，是什么造成其肠断，是否真的肠断，是不是值得肠断以及这些肠断的作品是否成功这些问题上。由于对庾信和南北朝的研究相对来

说还比较薄弱，所以本书也许要有一些事实的考证，但基本上还是以论证描述为主。

梁代末年的江南的确使人肠断。对其社会、历史的原因进行探讨，会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我国封建时代的本质以及各种现象。正如孔尚任所云：“春雨如丝宫草香，六朝兴废怕思量。”之所以“怕思量”者，是因为这一现象总是要在历史上重现，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使人肠断。诸如：侯景为什么能以数千人的兵力就在江南所向无阻、为什么萧梁朝野会那么软弱无能、为什么南朝文士有那么多不可理喻的嗜好和举动、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人一边批判六朝文士一边又在走着同样的老路？这些问题总是在困扰着人们。笔者希望如此种种在对庾信的研究中能得到比较清醒的认识。“山雨欲来春树暗，尽将情思写江南”，究竟能不能达到这一预期目的，就只能且听以下分解了。

二 王室身家两唏嘘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有很大的惰性。对庾信的评价也是这样。自从《周书·庾信传》中说了“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后，“乡关之思”便成了人们评论庾信作品的主要词语。张溥说：“乡关之思，仅寄于《哀江南》一赋。”后人更是扩而广之，认为“在他后期的诗歌中，‘乡关之思’是贯穿在许多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所谓‘篇篇有哀’，就是篇篇不离‘乡关之思’”。甚至还把他称为“望乡诗人”^①。

其实，只要从庾信的作品来考查，就会知道这种提法是不合适的。“乡关之思”不能概括《哀江南赋》为代表的一类作品的主题，也不是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之所以持旧论，还是惯性在作怪，大家宁可从事于弥缝维护旧日的结论，却没有去想真象应该是个什么。当然，空说无凭，还是让作品本身来说明罢。

庾信最重要的作品自然首推《哀江南赋》。他以本人的身世为经，以梁王朝的兴亡为纬，个人的经历和时事相穿插，描

^① 论庾信‘乡关之思’者甚多，此处仅引《中国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望乡诗人’见1984年10月9日光明日报第三版。“日本出版《中国的诗人》丛书”。

写出侯景乱梁前后江南的情形。赋中从叙述自己的家世开始，依次写梁王朝全盛时的情形、社会潜藏的危机、侯景乱梁、守军之败、奔赴江陵途中的见闻、元帝中兴、诸王争斗、西魏攻破江陵以及被俘人员的惨痛、对梁亡历史的总结和自己身世的感叹。不论从全篇的内容和写作目的来看都不是“乡关之思”。就拿其中最具有思乡意味的个别句子来看，也大多不是在思乡。比如“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两句，由于下面接着“中兴道销，穷于甲戌”、“天道周星，物极不反”，说明其意思是表示未能重新恢复梁朝。“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的下面由于接着“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说明“壮士不还”的意思是说自己未能完成出使的任务，并不是写要回故乡。“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由于上连“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下接“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说明还是在悼念梁亡，并不只是在思念故乡。“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表面上看好象是说庾信和思归王子一样思归，实际上，作者是用典象征。灞陵夜猎一句是以李广夜猎的故事来表明“可是哪里知道我还是梁朝的故右卫将军呢？”意思是说自己在北朝不是真正的将军。思归王子一句是以楚太子完入质于秦的故事来表明“我和思归的王子一样，还是咸阳一布衣。”意思是说自己是北周的平民，并不是真正的位望通显。这两句也不是思

归的意思^①。也许有人要举出“别有飘摇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来证明这是思乡，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庾信在叙述自己遭遇中的一小部分，它包括在对其身世的感叹之中。我们说“乡关之思”不是《哀江南赋》的主题，并不是说赋中就一点思乡的句子也没有。但是要根据这几个句子就说全赋的主题就是思乡，恐怕就以偏盖全了。

不仅仅是《哀江南赋》，庾信的其它表现悲哀之情的作品也是如此。如人们常提到的《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拟连珠四十二首》、《和张侍中抒怀》、《小园赋》等作品所表现的主题也并非“乡关之思”。对此，我们也可以一一考查。

《拟咏怀二十七首》写的是什么呢？其第一首“涸鲋常失水，惊飞每失林”、“由来不得意，何必往长岑。”描写的是初到北周的提心吊胆的生活。第二首“洛阳苏季子，连衡遂不连，既无六国印，翻思二顷田。”是慨叹自己出使没有成功。第三首写的是“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对自己被强留的愤慨。第四首写的是“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怀念在梁时的高位。第五首和第二十首写的是“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对自己仕周的惭愧。第六首、第九首“畴者国土遇，生平知己恩”、“昔尝游令尹，今

① 倪鲁玉认为思归王子是“梁国子孙客长安者。”陈寅恪认为是陈霸先之子陈项。实际上，梁敬帝其时已被杀，梁子孙不会思归；庾信在赋中骂陈霸先为“无赖子弟”、“反气”，不会自比陈之王子。这些解释都不妥当。

时事客卿”写的是对梁帝的知遇之情。第八首和第十一首“长坂初垂翼，鸿沟遂倒戈。”“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是对萧督及梁朝王子的谴责。第十三首和第十五首“惜无万金产，东求沧海君。”“始知千载里，无复有申包。”是对梁亡的愤慨。第十二首和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七首的“流星夕照镜，烽火夜烧原。”“南国美人去，东家枣树完”、“鼎湖去无返，苍梧悲不从”、“出门车轴折，吾王不复回”写了西魏灭梁、伤悼梁元帝之死，慨叹自己不能回朝复命。第十八首如第二十五首“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是无可奈何的自排自解。由上可见，《拟咏怀二十七首》的主题也不能以“乡关之思”来概括。

《和张侍中述怀》也是同样。“畴昔逢知己，生平荷恩渥”写了梁帝对他的恩惠。“道险卧辘轳，身危累素壳……”写了自己在梁亡之际的经历。“汉阳钱遂尽，长安米空索……操乐楚声悲，忘忧鲁酒薄”写了在北朝的生活。“徒怀琬琰心，空守黄金诺”指责了西魏的不讲信用。“虽欣曲辕树，犹惧雕陵鹄”写了对自己处境的不安。“何时得云雨，复见翔寥廓”是写希望能再遂凌云之志。可见所写的也不是“乡关之思”的内容。

《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除写了有关萧伪的一些内容外，还写了“无机抱瓮汲，有道带经锄”、“野情风月旷，山心人事疏”对避世者的向往、“汉阳嗟欲尽，咎繇惧忽诸”对梁朝宗室荡然欲尽的哀伤、“连盟翻灭郑，仁义反亡徐”对梁武帝误纳侯景的惋惜、“汉阴逢荷蓑，缙林见杖屨，阮藉尝思酒，嵇康懒著书”悲伤梁朝旧臣无所依归，希望忘却世事。可见所写也不是“乡关之思”。

《拟连珠四十四首》也是以梁亡和自己的身世为题材。倪鲁玉注曰：“信复拟其体以喻梁朝之兴废焉。观其辞旨凄切，略同于《哀江南》之赋矣。”由此可知也不是以“乡关之思”为主。

《小园赋》也是一样。“昔草滥于吹嘘，藉《文言》之庆余。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凰之虚。观受禧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写的是对自己在梁生活的留恋，对突然到来的动乱的哀叹。虽然有“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去国怀乡的话，但抒发的是“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没有完成任务和“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自己不能死节，致遭此辱，无力改变这种情况的慷慨。所以说还是和《哀江南赋》一致，表达的不是“乡关之思”。

既然庾信的《哀江南赋》一类作品表达的不是“乡关之思”，那末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庾信本人已作了解答。《哀江南赋序》中说：“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哀江南赋》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感情可用“悲身世”、“念王室”来概括。其它诸如《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拟连珠四十四首》、《和张侍中抒怀》等作品也是如此，都贯串着“悲身世”和“念王室”。《哀江南赋序》中还提出了他作文的旨趣：“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维以悲哀为主。”“记言”，就是记载历史。“危苦”，即庾信的危难困苦。使他“悲哀”的还是身世感和王室情。因此，无视这种感情而把他作品的主题归结为“乡关之思”，实在是贬低了其价值。

我认为庾信作品中“昔三世而无惭，今七叶而始落”感叹家世衰微的感情不能以思念家乡来概括。“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不特贫谢富，安知死养生”之类对自身经历的描述、对命运的愤慨也不是思念家乡所能代表了。“乃解悬而通籍，遂崇文而会武”、“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思。直言珠可吐，宁知炭欲吞”怀念在梁君臣风云相感之情不能归于“乡关之思”。“晋郑靡依，鲁卫不睦。竟回天关，争回地轴”、“蚁穴冲泉，未知远虑；玄禽巢幕，何能支久”对历史的反思是“乡关之思”所包含不了的。“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的自怨自责连系着王室情，也不能等同于“乡关之思”。总之，“身世”不仅仅是故乡，其自身的经历和遭际，是思故乡所概括不了的。“王室”不等同于故乡，“念王室”反映和总结了历史，不能和思故乡相提并论。两者的内涵都远远大于“乡关之思”。而且，庾信通过身世、王室反映了历史转折时造成的社会和人生的悲剧，所以，将《哀江南赋》一类作品的主题说成“乡关之思”是不妥当的。

当然，正如前面所说，笔者并没有否定庾信有思乡情。和寓居异地的人们一样，庾信也创作过思念乡关的作品。象《和王少保遥伤周处士》、《别张洗马枢》、《重别周尚书》等即是。就是在《哀江南赋》一类的作品中也有“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之类思乡的句子。但是，不能因此就以偏盖全。因为在《哀江南赋》一类作品中，这种感情溶化于家国感情之中，不是作者刻意表现的主题。如果说在“悲身世”、“念王室”中包含有“乡关之思”则可，而要说“悲身世”、“念王室”是为了寄寓“乡关之思”则是不可以的。

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周书》的作者要这样立论呢？

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都认可这一论点呢？我认为这并不难回答。

第一，之所以人们相信《周书》的论断，是由于受了《周书》写作者的蒙骗。《周书》的主编者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之一。其它两个编写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唐朝王室在内的唐初当权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这样就自然决定了唐初编写《周书》时的特别要求，即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和政治。所以《周书》之中当然不免有的地方象刘知几所指出的那样“事有不同，言多爽实”。出于这样的动机，《周书》的编写者对庾信这样一位梁代旧臣再仕北朝的人物，便不惜笔墨对其在北周被统治者“特蒙恩礼”、“位望通显”大加渲染，而《哀江南赋》中的“悲身世”、“念王室”也就被以“乡关之思”轻轻地掩饰过去了。

第二，之所以相信《周书》的论断，还由于人们对庾信立身行事的错误理解。庾信的出仕西魏和北周，在旧时代的人们看来是失节的行为。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信为梁元帝（应是简文帝之误）守朱雀航，望敌先奔。厥后历仕诸朝，如更传舍。其立身本不足重。”因此有些人就不相信他悲身世、念王室是真实的感情。如全祖望就说：“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结合南北朝的士人历仕异朝、不以为耻的社会观念，人们便很容易把庾信作品中的悲哀认定为人人都可能有的思乡之情。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能因为庾信仕周就否认他对梁王朝的深厚感情。首先，我们探讨作